

# 慈善夜市：近代印尼华人的公益实践

徐华炳<sup>1</sup> 叶舒<sup>2</sup>

(1.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2. 江苏省长江文化研究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自 1900 年吧城中华会馆创立以来, 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伴随华人社会的发展而日渐兴盛, 办学经费除学费外, 也从会馆资助逐渐转向直接捐款和社会筹措。慈善夜市作为华人办学经费筹措渠道, 20 世纪初即出现, 几经演变, 最终形成以华文学校师生为参与主体的教育夜市。通过梳理教育夜市的发展历程, 解析其基本性质、运作实态与社会经济效应, 证实它是近代印尼华人积极参与筹募华校经费的重要途径, 更是印尼华人社会实践在地慈善公益活动的主要介质。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华文学校; 办学经费; 教育夜市; 慈善公益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5)12-0084-08

**DOI:** 10.13713/j.cnki.cssci.2025.12.001

1900 年 3 月 17 日, 荷属东印度第一个华侨新型社团——吧城中华会馆 (Tiong Hoa Hwe Koan - Batavia, 缩略 T. H. H. K. - Batavia) 在巴达维亚创立。1901 年, 由其创办的中华学堂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所华文学校。此后, 印尼华校日益兴旺, 至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可观规模。

## 一、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一) 华文学校经费问题的研究状况

印尼华校的教育经费问题, 是中外华侨史研究者较为关注的话题。据已有史料, 有关印尼华校经费问题的记载, 可溯至 1905 年当地华人谢基祥所写的《慈善夜市举办时中华会馆诗书》<sup>①</sup>之后, 荷属华侨学务总会在 1918 年和 1919 年详细调查了荷属东、西部群岛的华校状况, 并依此编撰成《南洋荷属东部群岛华侨学校概况》与《南洋荷属西部群

岛华侨学校概况》, 较为全面地整理了当地华校经费的来源。1928 年, 该会又编写《荷印华侨教育鉴》, 同样整理了印尼华校的经费来源及存在的问题。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南洋华侨教育方面的书籍中, 也有关于印尼华校经费状况的记载。此外, 《南洋研究》《南洋周刊》《中国与南洋》《华侨半月刊》《申报》《东方杂志》等近代中文报刊, 也都刊载过印尼华校状况的文章, 其中多有述及当地华校的经费概况。

“二战”结束后, 关于该问题的记载大多散见于各华校纪念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 随着中国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提速, 该问题被学者们重新关注。如周南京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三宝垄华英中学筹措办学资金及日常学费的征求等内容;<sup>[1]</sup> 黄昆章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中探讨了不同时期华校的经费来源及存在问题;<sup>[2]</sup>

**基金项目:** 中国侨联课题“浙江华侨捐赠研究”(17BZQK215)。

**作者简介:** 徐华炳, 浙大城市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叶舒, 江苏省长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sup>①</sup>1905 年, 该诗书 (Boekoe Sair Tiong Hwa Hwe Kwan koetikaboekanja passar derma) 由巴达维亚班芝兰许清美出版 (Pantjoran, Batavia, Kho Tjeng Bie, 1905)。1971 年, 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 (Claudine Salmon) 在巴黎《群岛》(Archipel 2, 1971, pp. 55 - 100) 发表了论文《吧城“中华会馆”诗颂(1905)》(《Le sjair de l'“Association Chinoise” de Batavia 1905》)。2010 年, 芬妮·托雷特·哈迪彦托 (Fanny ThoretHadiyanto) 和耶里·维拉万 (Yerry Wirawan) 将其译成印度尼西亚文。2011 年, 周南京又译成中文版的《吧城中华会馆诗颂》。

别必亮在总结近代华侨教育的经费来源、筹集方式及经费管理时,也述及了印尼华校经费问题。<sup>[3]</sup>

印尼华校经费问题,同样吸引了中国、印尼以外学者的眼球。美国学者 Lea E. Williams 在论述 20 世纪初的华校经费来源及用途时,将之置于印尼华人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觉醒语境中考量;<sup>[4]</sup> 美国学者 Mary F Somers 则论述了印尼国籍协商会资助各地华校的情况。<sup>[5]</sup> 新加坡的 Ming Govaars 在概述欧式荷华学校与中华会馆学校教育时,简述了中华会馆学校的经费来源状况。<sup>[6]</sup> 此外,一些名人回忆录与地方侨史资料中也曾提及印尼华校经费状况。总体而言,已有的印尼华校经费问题研究,多以叙事为主,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

## (二) 印尼教育夜市问题的研究现状

作为华校筹集经费的渠道之一,教育夜市在相关史料中多有论及。吧华总教委会夜市委员会秘书处主编的《吧城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教育夜市纪念特刊》,是至今了解吧城华人华侨组织的首届“教育夜市”活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sup>①</sup> 一些与印尼华校有关的书刊,也载有教育夜市的内容。但整体来看,这些文本多属资料辑录,且过于零散。至于学术性成果,虽然中国国内论述印尼华文教育的文章多有涉及教育夜市,<sup>②</sup> 国外学者在探讨印尼华校经费来源时也有提及教育夜市,<sup>③</sup> 但对其多具象描述少本质探究。

基于已有相关成果留存的学术空间,本文以教育夜市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 20 世纪前半叶的印尼华侨华人史中,就发展历程、基本性质、运营面向及多重效应等方面作论述,继而解读教育夜市的活动主体如何参与,为何参与印尼华校的教育经费筹募,从中揭示海外华校的曲折发展以及海外华人慈善公益实践的路径。

## 二、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的经费来源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早期,当地华文教育经费多以甲必丹、雷珍兰等华人领袖与富商捐资为主,且与救济活动密切关联。1690 年,华人甲必丹郭郡观即向东印度公司提议建病厝、设义学,以解决华人社会的内部问题。1787 年,

甲必丹设立明德书院(后称明城书院)，“再来吧请设美色甘,建病厝,立义学,额曰‘明城书院’,以利后人,万代无穷之奕休”。<sup>[2]</sup><sup>27</sup> 明城书院不仅是印尼华文教育之肇始,且创设了社会捐资办学的模式。“吧城旧有捐建义学,名曰明城书院,延师养正蒙童,充贫民子弟肄业其中,供祀先贤……酌给逐年需费,讯即节劝吧中之富家善民乐捐,则捐廉为斯民宣导,是又生成之至意无穷也。”<sup>[7]</sup> 明城书院的运营表明,中国传统的乡土观与文化观形塑着当地华人精英的慈善理念。早期印尼华人社会以富人为主导并旨在救济穷人的捐赠行为,正是中国古代传统慈善移植海外的印证。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印尼华人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形态上,原先的税收承包、专利承包业务逐渐衰落,中介贸易、工业经济等新业态迅速兴起;<sup>[8]</sup> 人口构成上,原先印尼华人以福建人为主,20 世纪以来移入当地的非闽南籍华人明显增多,他们成为“新客华人”的主体;社会身份上,限于航海条件和移民男性化的影响,“土华通婚”在早期华人社会中很是普遍,土生华人因此成为当地社会为数不少的特殊群体。

基于印尼华人社会的上述新情状,以及现代传媒的普及,印尼华人的生活方式剧变,现代慈善理念渐兴,民众对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的关注度明显提高,进而使得华校经费愈加多元。

20 世纪以来,印尼华校经费除学费外,主要有直接捐款和筹措资金两种来源。直接捐款以校董事会月捐与商家月捐、货捐等形式较为常见。如 1910 年代的荷属东部群岛华校经费,“多颇充足,查其来源以出入口货捐为大宗,其办法,日派人调查华侨各商号进出口货总数,视其种类订税,则月终结算,以其半归原商,以其半充学校经费”。<sup>[9]</sup> 在荷属西部群岛,华校经费来源则更多,包括商店月捐、工头认捐、货捐等。<sup>[10]</sup> 除货捐与月捐外,一些华校发起的临时募捐,邦加岛的赌捐以及苏门答腊的船捐、屠捐等,<sup>[11]</sup><sup>59</sup> 也属于直接捐款。筹措资金则主要借助华校师生所参与的展览会、游艺会,以及集多方人士努力而举办的教育夜市来兑现。

①该纪念刊由吧城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夜市委员会秘书处编辑,吧城振源印务公司 1948 年 6 月 30 日刊印。内容主要是介绍吧华教育夜市筹备经过以及大会记录,包括中文序、印尼文序、题词、论著、大会记录、附录、广告、鸣谢启事等。

②如周南京翻译的《吧城中华会馆诗颂》,其中就较为详实地叙述了教育夜市举办及收益状况,参见:《八桂侨刊》2011 年第 3 期。

③如 Lea E. Williams 指出,市场(bazzars)的组织与运作,是中华会馆学校筹集经费的众多方式之一。参见:Lea E. Williams.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 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 - 1916 [M]. New York: Glencoe: Free Press, 1960: 78.

### 三、印度尼西亚教育夜市的实态

荷属东印度时期,向殖民政府申请补助的华校并不多,当局对华校的补助津贴也较少,由此迫使华校解决办学经费除固定学费外,多赖当地华人捐款。<sup>[2]27</sup>教育夜市,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印尼华人捐赠当地华校的主要方式,成为多姿多彩的印尼华校经费来源之一。因其以商品义卖与慈善义演为主要表征,所以也是在地华人捐助华校较为代表性的慈善路径。

#### (一) 教育夜市历程

“教育夜市”较为频繁地出现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相关史料中。就笔者所阅及的资料来分析,其最早可追溯至 1904 年 10 月 5—7 日由吧城中华会馆所举办的慈善夜市。此后,三宝垄中华学校与华英中学 1925 年合办了教育夜市,三宝垄中华学校又于 1926 年、1927 年、1932 年和 1934 年单独创办四次夜市。1940 年和 1941 年,雅加达中华中学为抗战募捐而开设两次慈善夜市。1948 年 6 月,“为统筹本吧三十余所华侨中小学校经费”,雅加达华人集全市之力,在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规模盛大的第一届教育夜市,众多华校参与其中,“为南洋统筹华校经费之先声”。<sup>[12]</sup>

教育夜市的举办,直接扩大了华校在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力,而华校的发展又促进了教育夜市的兴盛。“以华侨教育夜市为契机,相信可唤起华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与注意,亦惟为华侨对教育更有清楚的认识与注意,募集教育经费的成绩,才更有可观。”<sup>[13]33</sup>可见,它不仅推动了印尼华校的发展,而且见证了印尼华文教育的心路历程。

#### (二) 教育夜市性质

夜市,在马来语中叫 Pasao Maleno。印尼夜市多种多样,因其性质不同,相关的组织者及参与者亦有差异。由地方政府筹办的称为“政府夜市”,由华侨呈请地方政府筹办的称作“中华夜市”,<sup>[11]58</sup>以华校师生参与为主的通称为“教育夜市”。举办教育夜市的目的,不仅在于筹募学校经费,更在于以此向社会展示华文教育的成果。因此,它在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相当意义。如 1904 年的慈善夜市,“会馆设想真完善,遵循孔子仁教案。教育普及实现时,华族无忧心平安”。<sup>[14]</sup>1948 年举办的雅加达教育夜市,更直言不讳地点明其普及教育的目的。“此次举行夜市之目标,一为统筹教育经费,二

为展览学生成绩。集吧城侨教之精华,作互相观摩之举,意义极为重大。”<sup>[15]16</sup>

教育夜市作为由印尼当地华校发起,旨在筹集学校经费问题的一种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经济活动——“慈善市”,<sup>[14]</sup>其筹办、组织、运作等多依赖在地华人及其社团。从《吧城中华会馆诗颂》对 1904 年慈善夜市的描述中,就可见这些特征:“孔子生日适逢时,华人协商达共识,商店关门都歇业,通力合作办夜市”。“慈善夜市初开张,董事学生聚一堂。”“慈善夜市今举办,旨在拯救人苦难,义举自愿不强迫,顺遂心意皆乐捐”。<sup>[14]</sup>又如 1932 年三宝垄中华学校复开夜市,即由该校代总理尤水地担任夜市总理,中华学校的各校董分别认股出资,得利四千多盾,还清学校一切债务。<sup>[16]28</sup>1947 年 12 月,吧城华总教育委员会创立教育夜市设计委员会,所聘请的主任委员就是当时吧城中学校长司徒赞。1948 年 1 月成立的“吧华教育夜市委员会”,也是推举在地各华校校长、社会贤达五十八人为委员。<sup>[13]2</sup>

#### (三) 教育夜市场景

物品陈列是教育夜市对外展示的主要形式。其教育夜市场内所摆设的各种义卖物品,数量之丰,令人目不暇接。1904 年的慈善夜市里面,“琳琅满目义卖品,买卖兴隆靠情亲,当时真正好生理,义卖物品一扫尽”。<sup>[14]</sup>1948 年的吧城教育夜市设有义卖处,义卖品包括雪糕、点心、柑水、啤酒之类,且每日买卖物品均不同。<sup>[13]47</sup>雅加达吧城中学则在本次夜市上专设“巴中馆”,一为筹集华校经费之途径,二为展示该校师生成绩之窗口。馆内所陈列的手工艺品都出自该校师生之手,物品之多、种类之富,令人眼花缭乱。此外,参与教育夜市的商家群体在捐助义卖品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如在 1948 年的吧城教育夜市上,商家们捐助了形形色色的义卖品,其种类之多,足见夜市的繁盛。

教育夜市的各种娱乐活动,是其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时人描述,其义卖物品的多样及娱乐活动的多姿多彩,如同博览会一般。<sup>[11]58</sup>在 1948 年的吧城教育夜市上,娱乐活动多由游艺运动组承担,既有舞龙、舞狮、彩舟竞赛等中国传统习俗文化活动,也有爪哇戏、马来戏、顺丹舞、印尼武术等当地民俗文化表演,还有自西方传入的电影、篮球赛、提灯游行等娱乐项目。游览者对于这些活动自是喜闻乐见,如夜市内的爪哇戏“颇有艺术风味,土人不消说,大半侨生对这也是非常有兴趣的”。<sup>[13]48</sup>

教育夜市借助多样式、大众化的娱乐展演,吸引众多社会群体参与其中,不仅活跃了其气氛,丰富了其内容,更是借机增加善款,甚至借此向华人社会点明教育的意义。例如1904年的慈善夜市,在会馆师生的大力宣扬下,收益颇丰。“慈善夜市真热闹,参观印象颇奇妙,夜市举办收益丰,万一荷盾入库了。”<sup>[14]</sup>再如1948年的教育夜市,不仅筹到了学校所需的经费,更是借此向社会宣扬教育的真意。“教育夜市举行,只是统筹教育经费的一种办法。我们希望本吧殷富侨商,明了教育意义的重大。教育的良窳,不但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盛衰,而且亦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后代。海外侨胞,捐产兴学,相习成风,实为一好现象。”<sup>[15]17</sup>

#### (四)教育夜市效应

教育夜市作为“巴城华侨教育界的创举”,由于多族群、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各种义卖品及文娱活动的丰富展示,呈现出多面向的效应,其“可宝贵的并不是各种游艺表演,学生的成绩展览,以及学术上的比赛与活动,乃是一种在和协空气中进行而有纪律、有热忱地工作表现和融洽的互助的精诚合作”<sup>[15]13</sup>

首先,它增进了游览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如孔子儒学思想在1904年慈善夜市活动中得到了推崇:“慈善夜市初开张,董事学生聚一堂,孔子美名受崇敬,至圣先师高无尚。”<sup>[14]</sup>再如1948年的雅加达教育夜市,由华校师生构成的游艺会组与成绩展览组,向当地人士展示了书法、刺绣以及国语演说比赛等含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sup>[13]12</sup>其次,它催发了不同族群的慈善情怀。教育夜市不仅彰显印尼华族的公益心,而且吸引荷兰人、印尼人热心慈善。1914年的“慈善夜市众颂扬,参观游客心舒畅。……多纷进贡,捐献踊跃慨而慷。”<sup>[14]</sup>1948年的雅加达教育夜市吸引了不同族群的广泛关注,其收益亦十分可观。“这次夜市全部门票收入约有五万余盾,成绩义卖约四千三百盾,妇女组义卖约二万有奇……此次夜市成绩,可望净得五万余盾。”<sup>[15]18</sup>再次,它促进了买卖双方的良性互动和不同华校师生间的良好交流。教育夜市中的商家与顾客,都会因夜市的慈善宗旨而随心交易。“乐捐明文有规定,善品义卖价随情,购买善品应知晓,超值自然不退清。”<sup>[14]</sup>因此,买方积极参与,卖方获利颇丰。如1926年和1927年由三宝垄中华中学所举办的两届夜市“均获巨款”。<sup>[16]28</sup>同时,华校之间通过参与夜市的成绩展览、游艺表演和体育

活动等,增强了沟通,密切了联系,提升了印尼华校的整体力量。<sup>[17]</sup>最终,因为“华侨教育有着蓬勃的朝气、竞争的内心、求进的热望,所予社会人士的印象,也极良好,从而激励社会人士对侨教更富赞助与督促的热情”。<sup>[15]13</sup>总之,不同的参与群体、多样的义卖载体、异质的展演模式,因教育夜市的慈善主旨而汇聚生力,最终推动了印尼华校的成长和华文教育的发展。

## 四、教育夜市中的慈善群体

教育夜市作为融市场与慈善于一体的社会经济形态,其发展和繁荣得益于组织者、参与者及受众体的共同努力。华人精英阶层的组织,增强了夜市的社会影响;各族群民众的协调,扩大了夜市的市場生命力;华文学校师生的经营,则保证了夜市的慈善内涵度。

### (一)以校董为代表的华人精英

华人精英的支持是促进教育夜市发展的重要保障。1904年吧城中华会馆举办慈善夜市,玛腰、甲必丹亲自莅临,“玛腰结伴来光临,甲大贤绅纷纷跟进,男女老幼大聚汇,慈善夜市鼓号鸣”。<sup>[14]</sup>1934年三宝垄中华学校为庆祝建校30周年举办教育夜市,校董们“合认五千盾为担保金”。<sup>[16]29</sup>为筹建1948年吧城教育夜市,吧城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专设教育夜市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顾问、名誉主席、正副主席、秘书处、财政处、总务处和各小组委员会组成。时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蒋家栋担任教育夜市委员会名誉主席,巴达维亚影业公司经理杨季眉和中华总会的多位理事也积极协助筹办。<sup>[13]89</sup>当然,华人精英不只通过教育夜市为华校经费的筹措而出力出资,他们在印尼华校发展的各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1901年,以潘景赫为首的中华会馆资助创建了吧城中华学堂,成为印尼第一所华文学校。1920年代,洪渊源在担任万隆中华会馆秘书时,竭力游说华人旅馆业主及旅客,向他们阐述华语教育之重要性,为该市华校筹集资金。<sup>[18]27</sup>

各华校的董事,是最为关心亦是最直接资助学校建设的在地华人精英。“校董们大都热心教育,竭力赞助提倡,也是他们的素愿。”<sup>[13]48</sup>校董们主要通过直接捐赠与筹集资金的形式,为所在华校提供办学经费。直接捐赠方面,“董事月捐”是最为常见的华校经费来源。不过,这种捐赠所能募集的资金并不多,“普通每月数角至数盾”,<sup>[19]176</sup>并且“自愿

认捐者,更寥寥无几”。<sup>[20]</sup>当然,董事也会为华校直接捐资捐物。如在 20 世纪前期吧城中学发起的新校址建设运动中,该校董事会的刘家祺、刘英鹏、刘宜应、徐育梅四位人士主动捐赠地皮 1.6 万平方米,<sup>[21]</sup>为吧中的建设做出极大贡献。募集资金方面,董事群体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类渠道筹款。1910 年时任爪哇学务总会总理的陈显源“从承包马吉垄监狱伙食和承包彩票的获利中”筹措华侨中学经费。<sup>[22]</sup>20 世纪前期时任玛琅中华中学校董的黄丹季为能筹集到建设学校新校址的经费,游走于玛琅与雅加达之间游说,最终筹措到 600 万盾,保证该校物理与化学实验室、教师公寓、礼堂及运动场的顺利建成。<sup>[23]</sup>

### (二) 以师生为代表的学校众人

印尼各地华校的师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夜市的各项活动,且为学校经费的筹措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一方面,师生群体为教育夜市的运作尽心尽力。在 1948 年雅加达教育夜市上,师生们为筹措学校经费颇为用力,“据说学生游艺表演中有不少筹备周全,训练有素的节目,像光明一校,虽然表演一个节目(仲夏夜梦),可是场面伟大,立体布景,演员二十五人全体出台”。<sup>[13]48</sup>另一方面,由于师生们并不具有校董们所拥有的丰裕财富与社会声望,因此由他们直接捐钱资助的事例较为少见,更多的善行义举是借助相关活动来为学校筹措资金。

华校师生筹措经费的方式形形色色,大多以游艺会与展览会为主。游艺会,是向当地人士展示各种娱乐表演、以此筹集经费的形式,<sup>[24]</sup>演出的内容以歌舞、戏剧以及乐器演奏为主。20 世纪 30 年代,据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的统计,该区域平民学校经费,除学生学费与党员月捐以外,“大都赖学生演剧筹款来维持”。<sup>[25]</sup>1947—1948 年,吧城中学“曾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游艺会,其中有两次为学校筹款”。<sup>[26]19</sup>特别是 1948 年 4 月 12—14 日晚,该校的学生自治会开展多幕剧公演“法西斯细菌”,为学校募得 38306 盾资金。<sup>[26]A.15</sup>20 世纪 30 年代,有些华校师生开展以拍卖图工成绩品为主要内容的展览会,与游艺会一起成为筹募华校经费的重要渠道。<sup>[11]58</sup>1948 年的雅加达教育夜市,专设“学校成绩展览馆”,所展物品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既有义卖品,也有非卖品。<sup>[13]48</sup>

### (三) 以商家为代表的社会大众

教育夜市虽以慈善为主题,但终归以市场为载

体,因此活动现场不乏众多商家身影。商家群体的积极参与,同样是教育夜市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1904 年吧城中华会馆举办教育夜市时,“商店关门都歇业,通力合作办夜市”。<sup>[14]</sup>20 世纪 30 年代的夜市,“里面的建筑和陈设,好像博览会的五花八门。各种商品和土人的工业品的陈列;各种游艺场所的布置”,甚为丰富。<sup>[11]58</sup>1948 年雅加达教育夜市,教育夜市常务委员会不仅下设“摊位酒家劝募组”“广告劝募组”开展现场劝募活动,而且夜市现场直接设有弹子房、游戏摊、菜馆、照相馆以及广告社等,场景颇为热闹。同时,妇女组还向各商家募得“饮料、食品、日用品、玩具、花裙、布料”等物品。<sup>[13]47</sup>在此次夜市结束后,众多商家又捐助吧华总教委会夜市委员会秘书处编发纪念特刊。

除参与夜市,商家也时常为华校经费提供直接资助,商店月捐、货捐、旅馆捐等即为常见形式。如荷属华侨学务总会视学熊理在 1918 年调查爪哇华校时指出,除固定学费以及董事月捐外,进出口货捐亦是当地学校经费来源之一。<sup>[27]</sup>当然,商家经营的盛衰也因此往往密切影响华校的发展。“记得在 1924 年以前,南洋商情很好,侨商都利市百倍,华校的经费,很是充足,学校的数量,也逐年增加。”<sup>[11]57</sup>“在商场兴盛时期,各方热心捐款,只足维持现状。一遇商场冷淡,向之捐款者,欲维持其本身且不遑,何有余款维持学校?”<sup>[19]345</sup>

除各类经营者,当地华社的中华业余励进社、自强社、侨商联合会、山东公会、群乐社、中华合唱团、篮球总会、足球总会、簾器该会、兴宁同乡会、莺莺社、保安队总部、荷印童子军总会,以及其他西乐队等十多家群众团体或社会组织也参与教育夜市。如 1948 年教育夜市的公开演奏会,“人才济济,演出极佳”的“华侨知名组织”——中华音乐会就“到会助兴,更见热心赞助教育”。<sup>[13]48</sup>

综上所述,多元的慈善群体,虽慈善动机不同,慈善路径各异,但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眷恋,共同造就了印尼教育夜市的繁盛,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印尼华校经费。

## 五、影响华侨华人慈善行为的因素分析

教育夜市旨在为华校筹募经费,各参与者固然乐善好施,但异质的慈善群体势必呈现多样的心态。关于华侨华人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地认为“爱国爱乡”“维系中华文化”等

是主导性动机。但分析教育夜市中的慈善群体案例,发现华侨华人群体归属的差异性、博取名望的功利性和原乡意识的制约性,同样限制或左右着他们的慈善实践。

### (一) 族群归属的差异性

整体来看,新客华人与祖国的联系较为密切,华文学校成为他们维系中华文化和认同中华民族的重要载体。美国学者施坚雅就认为,自1901年印尼第一所新式华校设立伊始,该类学校就成为新客华人“为长久保持较‘纯粹’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手段”。<sup>[28]</sup>而土生华人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如荷兰中华会作为印尼土生华人的留学组织,更倾向于关心他们在荷属东印度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会员在完成学业后会选择回到爪哇。<sup>[29]</sup>这种相异的情状也时常影响华校内部不同群体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王赓武等在分析新马华人教育时就发现,校董对华校的期望是将学生培养成为能适应当地商业发展的人才,但教师以及家长则希望学生们倾向于中国。因此,华校在语言、教材、教法等方面都模仿中国教育的行为。<sup>[30]</sup>

印尼华人社会的族群认同观念,同样影响他们对华校的捐助行为。一方面,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归属感,通常成为华校筹集经费的重要号召力。著名印尼华人领袖洪渊源在规划及实施华校经费募集方案时,就非常形象地叙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力量:“第一步,我先熟悉旅馆老板们。然后,我耐心地使他们认识到华文教育对后代的重要性,如果华侨还要保持作为中国人的话。我还要激发他们热心公益的精神,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当唤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之后,我开始向他们说明中华学校的财政困难,以及向旅馆的客人募集少量捐款的计划。……我每月一次到这些旅馆收钱。万隆的所有华人都不反对我们的计划。这样,我们每月可以收到300至400多盾”。<sup>[18]28</sup>另一方面,华侨华人对在地利益的现实考量又时常影响他们的捐赠动机。《荷印华侨教育概论》在评价荷华学校<sup>①</sup>所具有的教学/就业优势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华侨华人追逐在地利益的行为将会深刻影响华校经费筹措乃至整个华侨教育。“中外教育之效果,相形见绌如是,以致凡拥有中上资产之家,往往口唱兴学,而

躬自遣送其子弟就学外人所立之学校中。循此趋势,我华侨教育,有将破产之绝大危机,而教育经费之无着,各方之阻力不與焉。”<sup>[19]54</sup>

### (二) 博取名望的功利性

商业资本,是华侨华人获得广泛的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华人社会一些人士会通过各类捐赠甚至行贿官府的方式,博得相应的名望。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部分富有的南洋华人用资金贿赂荷兰人,进而成为管理华人社会事务的“甲必丹”。“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兰,其推举有甲必丹、大雷珍兰、武直迷、朱葛礁诸称呼,俱通称甲必丹。”<sup>[31]</sup>同理,海外华人也通过晚清的鬻官制度或捐赠方式获得官爵,从而树立和提升本人在华人社会的威望。<sup>[32]</sup>

华侨华人赢取社会声望的路径,也发生在捐赠华校的过程中。华侨华人捐助华校客观上有利于学校发展,但一些捐赠者的主观用意是借此谋取学校的行政权力或各类社会头衔,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巴城中学校长司徒赞就曾指出:“对于巴中之经费筹募等,热心赞助者固然不少,但徒挂虚名者居多。”<sup>[26]14</sup>“我华侨热心兴学之故,却不是为的教育,不过因受好名的虚荣,为争总理、财政、董事的头衔,以博一时的光荣,和一般人的成羨罢了”,<sup>[19]151</sup>但“在华侨社会有钱的人很多,所以单是富有是不足使人敬仰,以是借办学来出风头,以门外汉来参与局内事,妨碍教育的进行”,<sup>[19]417</sup>甚有少数华侨华人为争校总理一职而大撒钱财。<sup>[19]152</sup>更糟糕的是,这些获得学校行政权的华侨华人,对教育事业一窍不通,却又干涉学校内部事务。“一般的侨胞所以选举他们做校董,也无非是不过要他们拿出钱来维持学校经费。这种功绩我们应当不能一概抹杀。可是他们时常干涉校务,滥荐教员,以至引起纠纷。”<sup>[33]</sup>不难得出,捐赠华校经费成为某些华侨华人炫耀其财富和谋求其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 (三) 原乡意识的制约性

地缘、血缘等原乡要素,是海外华侨华人在他乡构建自我社会网络的重要经济和文化纽带。这些从籍籍地随移民而来的原乡意识,既可促进华侨华人抱团成长,也会阻碍他们的向外拓展,以致形

<sup>①</sup>荷华学校,全称“荷兰华人学校”(Hollandsch-Chinesehe-School,简称HCS),是荷兰殖民政府于1908年为在地华人专门开设的一种欧式学校。因该类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等与当地荷兰学校相同,其就业前景优于华文学校,吸引了不少土生华人子弟入学。

成狭隘的地域帮派观念。华校同样受到华侨华人原乡意识的影响。那些接受地缘性社团资助而建的华校,既在草创期获得充盈经费,却又在发展中受困于地域或帮派纷争。“苏岛某校,其总理初为某某两派人轮流当选。某派一为总理,则校长其私人也,教员其私人也。而另一派遣其子弟退学,一任某派畅所欲为。另一派为总理,一扫前任之人物势力,而完全代以己派。其后之于分立两校,然而不久又党派分立。”<sup>[19]349</sup>“董事部常以某省某地人之区别,引起争端。甚至分离另办一校者,比比皆是。”<sup>[19]392-393</sup>“荷印华校的教师…缺乏合作和研究的精神,新客和侨生,既积不相能;江浙与闽粤,又格格不入。”<sup>[11]62</sup>

随着原乡意识逐渐渗透至华校办学各环节,进而也影响到学校的经费来源及其捐助群体。“一般来说,同一个地区或一个社团办的学校,可能会因互相之间的不团结、闹意见而使经费拮据,例如爪哇华侨中学就是因此而停办的。”<sup>[2]65</sup>置华校发展于更糟糕处境的,是校董间有为争总理头衔不得而将华校分立的局面,其结果直接导致华校林立,进而使原本就依靠筹资运行的华校在办学经费上捉襟见肘,最终严重阻碍了印尼华校事业的整体发展。<sup>[19]153</sup>在筹措华校经费时,校董诸君亦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董事们因籍贯不同,闽人和粤人划了一条界线,办学时酿成党派,聘请教师筹划经费和办学的见地不同,因此就要引起了裂痕,影响学校不浅。”<sup>[34]</sup>由商家供给的货捐,也因地域观念的介入而增加征收难度。“这种办法,本是很好,可是,华侨们缺乏团结,常因地域关系,各争势力,互相破坏。而征收捐款,意见也不一致,齟齬,拒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土产捐之困难,也是如此的。”<sup>[11]58</sup>

从上述分析可见,华侨华人慈善公益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实践过程。动机既有主客观原因,也有宏微观因素,分析时不能以“政治化”“泛化”的解读遮蔽华侨捐赠的社会分层、分化现象。正因“华侨捐赠行为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转移或社会再分配,而是一个关系国家、社会和个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甚至情感的系统性过程”,<sup>[35]171</sup>所以华侨华人个体对慈善公益的内涵与作用必然产生差异化的理解。

## 六、结 语

近代海外华侨华人在侨居地接续地开展了丰

富的、多样态的慈善公益活动,教育夜市就是近代印尼华侨华人在当地进行的一种社会参与广泛、地域特色明显和亦捐亦商模式的慈善公益实践。慈善公益就其本质而言,毋庸置疑是捐赠者基于利他因素,从而牺牲自身利益的行为。华侨慈善公益行为无论是“慈善夜市”“教育夜市”,还是义卖、义演,都只是载体或方式,所以研究其本质问题“要回到创造事业的主体——华侨,回到事业的主体——慈善公益,回到事业的主旨——服务社会”上来。<sup>[35]172</sup>正基于此,本文在考察教育夜市动态演进和静态面向时,较为侧重于社会史、人类学的知识与方法,并由此获得些许的慈善公益研究心得。

从社会史角度来说,研究慈善公益需要整体性、日常性和多维度的视野。“社会史着力关注普通民众、展现日常生活、深入具体社群,还历史以‘整体性’面目。”<sup>[36]</sup>以教育夜市为代表的经费募集活动,不仅是华校与在地社会互动的重要窗口,更是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生存模式的多样。形形色色的筹募手段,正是当地华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不同慈善群体的差异化行善动机,恰好揭示了华侨华人社会阶层的流通渠道与上升路径。

运用人类学的实证分析,则可以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再谈旧问题。回溯教育夜市与华校经费的运行,一方面发现了印尼华人社会族群内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同为华人族群的文化一致性。华侨华人群体都怀有基本的慈爱仁义,都愿意为下一代的教育做慈行善。所以,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既能赅续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又愿接受现代公益理念。

总之,研究华侨华人慈善公益问题乃至慈善史,要跳脱“爱国爱乡”“维系传统文化”等固有范式,转向运用日常史、全息视角探讨善行义举。这不仅体现了跨学科对话的重要性,更在于不同学科方法的互渗将使得研究中的事件与结构、整体与局部、时间与空间融合起来,摆脱碎片化的叙事,以求还原历史全景。

### 参考文献:

- [1]周南京.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622-625.
- [2]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 [3]别必亮.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M].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63-189.

[4] Lea E. Williams,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 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 - 1916* [M]. New York: Glencoe Free Press, 1960:76-81.

[5] Mary F Somers,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4:22.

[6] Ming Govaars, *Dutch coloni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Indonesia, 1900 - 1942* [M].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Press, 2005:54.

[7] (荷)包乐史,主编.公案簿:第8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341.

[8] 施雪琴. 20世纪初期爪哇排华运动探析[J]. 南洋问题研究, 2006(3):80-89.

[9] 作者不详. 南洋荷属东部群岛华侨学校概况[J]. 教育公报, 1919(3):55.

[10] 熊理. 南洋荷属西部群岛华侨学生概况[J]. 教育公报, 1919(12):21.

[11] 陈瑗父. 荷印华侨教育概况[J]. 华侨半月刊, 1934(49-50).

[12] 本报吧城讯. 教育夜市[N]. 申报, 1948-07-08(7).

[13] 吧华总教委会夜市委员会秘书处. 吧城中华总会教育委员会教育夜市纪念特刊[Z]. 内部刊印, 1948.

[14] (印尼)谢基祥. 吧城中华会馆诗颂[J]. 周南京, 译注. 八桂侨刊, 2011(3):19-24.

[15] 夏时行. 吧华第一届教育夜市缩影[Z]. 华侨教育公报, 1948(4).

[16] 三宝垄堃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堃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Z]. 椰嘉达振源印务公司, 1954.

[17] 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 编. 社论全集(之一)1945年—1948年[M].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462.

[18] 洪渊源. 洪渊源自传[M]. 梁英明, 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89.

[19] 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辑委员会. 荷印华侨教育鉴[Z]. 内部刊印, 1928.

[20] 文心. 爪哇华校教育之检讨[J]. 侨务月报, 1935(6-7):14.

[21] 刘宏谦, 编. 思母集:联中、巴中、雅中校史片断[Z]. 广州巴中校友编委会刊印, 1993:27.

[22]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2辑[Z]. 孙承, 译.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299.

[23] 李卓辉. 披荆斩棘 拼搏奉献:印华文化教育史话之二[M]. 雅加达:联通书局出版社, 2006:161.

[24] 作者不详. 吧城中华会馆学校筹款夜市时学生之游艺[J]. 教育杂志, 1923(2):1.

[25] 钱鹤, 编. 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Z]. 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 1930:506.

[26] 民国卅七年高初中毕业纪念刊编辑部. 爪哇巴城华侨公立巴城中学高中第二届初中第三届毕业纪念刊[Z]. 内部刊印, 1948.

[27] 熊理. 调查民国七年爪哇华侨教育调查报告(附表)[J]. 教育公报, 1918(14):2.

[28] (美)G. W. 史金纳, 力践. 爪哇的中国人[J].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1963(2):26-32.

[29] (新加坡)苏里亚迪纳达. 爪哇土生华人政治(1917—1942)[M]. 李学民、陈巽华, 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52.

[30] (新加坡)王赓武, 郭梁. 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J]. 南洋问题研究, 1983(3):59-73.

[31] 王大海. 海岛逸志[M]. 姚楠、吴琅璇, 校注. 香港:学津书店, 1992:4.

[32] (澳)颜清湟. 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M].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0:69-70.

[33] 陈章, 言论. 爪哇华侨教育的危机[J]. 荷属华侨学生会季刊, 1927(1):20.

[34] 作者不详. 爪哇玛琅中华学校叁十周年纪念特刊[Z]. 内部刊印, 1934:22.

[35] 徐华炳. 近代华侨慈善公益实践研究[D]. 苏州大学, 2022.

[36] 小田. 社会史的“整体性”与“田野工作”[J]. 江海学刊, 2004(3):141-147.

[责任编辑:翟宇 吴晓敏]